

历史
五千年
之二

中华名人大博览

之二



沈阳出版社

中华名人大博览

张安华 尚光达 主编
张志强 秦 旭

沈阳出版社

目 录

白居易	653
黄 巢	687
赵匡胤	699
苏 轼	712
岳 飞	743
朱 熹	775
辛弃疾	815
关汉卿	842
成吉思汗	866
忽必烈	892
郭守敬	932
文天祥	942
朱元璋	982
郑 和	1024
李时珍	1052
张居正	1089
戚继光	1124
徐光启	1163
李自成	1204
黄宗羲	1235
顾炎武	1254
郑成功	1290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居太子少傅,后人因此称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原籍太原,后迁下邳(陕西渭南县)。

科举入仕

“安史之乱”后,时势逐渐趋向安定,因大乱而崩溃的各种制度也开始得到重建,白居易也结束了漫长的江南寓居生活,得以重返北方,于是就在父亲曾经任过职并且有亲戚的徐州安顿下来。在他年满二十岁时,在符离正式开始进士科考试的准备工作。他在《与元九书》里回顾当时的情景时说:

二十年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后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

如上所述,他年复一年地每天过着“苦学力文”的生活。

父死后,服丧徐州,接着不得不移居洛阳,家境变得日益艰难。白居易回忆这段时间曾说过:吾家世以清简垂为貽燕之训,叔父奉

而行之，而不敢失坠。

不过白居易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不久他在浮梁的哥哥的帮助和溧水的叔父的支援下，参加了乡试，由于准备充分而一举突破难关。接着他到长安，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翌年正月，他向给事中陈京呈献了一百二十首诗的诗集，请求给予文学评价，并且倾诉了自己的决心，请求其向礼部侍郎高郢推荐。

及第之后，白居易写了一篇文章献给主考官高郢，接着回到洛阳母亲处详告考试经过，随后又到徐州、宣州与亲戚朋友们一起分享快乐。这之后，白居易更加坚定了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决心。

为此，他预先设想了各种各样的纷争内容，用特殊的文体对此一一进行判定，其数量多达近百篇，后来被称为“百道判”，作为模范答案而为年轻的应考者们所珍视。贞元十八年（公元 802 年）的冬天，白居易在吏部侍郎郑珣瑜的主持下应考。翌年春天，他以优良的成绩及第。

贞元二十一年也就是永贞元年（公元 802 年），白居易写了《上宰相书》，以很有把握的口吻首先批判了现实政治：“至使天下之户口日耗，天下之士日滋；游手于道途市井者不知归，托足于军籍流放者不知反。计数之吏日进，聚敛之法日兴。田畴不辟，而麦禾之赋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价日贱。吏部，则士人多而官员少，奸滥日生；诸使，则课利少而羨余多，侵削日甚！举一知十，可胜言哉！况今之域未甚安，边陲未甚静，水旱之灾不减，兵戎之劫无期。”

白居易着重指出了从安史之乱到外族入侵到藩镇骚扰等长期战乱的余波迄今未息，从建中到贞元，虽然作了种种恢复秩序的尝试，但并未导致社会的全面安定。不过当时政治改革的势头已在逐渐高涨。在与贵族式的高级官僚阶层相对抗的王叔文、王任的指导下，年轻的官僚们掀起了变革运动。柳宗元和刘禹锡也参加了这次运动——这就是“永贞革新”。

翰林学士

制科及第的几天后，白居易被授命京兆府幸屋县尉。不久，又兼摄于长安以东，管辖会清宫西北的与幸屋同等级的昭应县的事务。职务虽繁忙，但白居易有时也度过了悠闲的时光，那时他所创作的诗歌中有一首就是《长恨歌》。一天，他和住在幸屋的陈鸿、王质夫一起游玩仙游寺，眺望马嵬坡，驰思骊山，互相谈论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他曾向王质夫赠过一首诗，诗中含有如下联：

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

写作《长恨歌》的翌年秋天，白居易任京兆府考官，在乡试中录取了萧浣。考官之事结束后，白居易兼任集贤殿校理。这也是“好文”的王起曾经任过职的地方。这年年末，白居易应翰林院之召，通过了一系列的制诏考试，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这是根据喜欢白居易诗歌的宪宗皇帝的旨意而定的。

从此，白居易凭借文学，走上了参与政治的道路。他起草了许多诏诰，例如《答高郢清致仕第二表》、《与迫鹤司汗书》等等，包括从大小官员的任命到外交文书。但是白居易也悄悄写了一些不依皇帝旨意而出于自己特别意图，应视为“抑制”的东西，《杜佑致仕制》就是其中之一。

在白居易看来，文学不是隶属于政治的，而是指导政治的东西。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天，白居易被任命为制科考官之一，在“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选出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他们俩后来均当了宰相，对白居易一直抱有好感。制科事毕，白居易执翰林学士时，同时被新授左拾遗。当时他向宪宗上表，首先表示要“粉身”、“答殊尧”，然后提出上次制科人事安排不当的问题。虽然其建议未被采纳，但是白居易并未畏缩。

由于旱灾带来的饥馑，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对此，白居易也上书请求大量减免租税，还建议解放宫中的女官和宫女，减少定员，节约冗费，禁止南方福建等地的人身买卖。另以闾乡牢狱的实情为中心，对各州犯人的悲惨遭遇深表忧虑，请求给予减刑或恩赦。白居易还对那些为了步步高升而向皇帝进献宝物的身居高位者进行严厉谴责。例如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进奉银器以求取皇帝的恩宠；淮南节度使王锬对百姓横征暴敛，聚积钱财，名曰“羨余”进奉给宪宗，并买通宦官，求取宰相地位。白居易对这些本无功绩，却用金银财宝来买宰相之任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抨击。另外针对企图把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委以讨伐叛乱军重任的动向。河朔的卢从史和王承宗不服从中央命令，宪宗想调动征讨大军，但白居易多次进言指明具体弊害，请求速罢军事行动。

白居易还常常把类似的题材写成诗歌，他在《杜陵叟》一诗里这样诉说了苦于征税的农民的生活：

典桑卖地纳房租，明朝衣食将何如？

感伤宫女辛酸的有《上阳白发人》和《陵园妾》。在《道州民》里，对朝贡云南矮人之事进行了严厉抨击。另外，憎恨宦官的横暴，写了《卖炭翁》。在《宿紫阁北山村》里，对乱闯民宅、任意征敛的暴力行为作了如下揭露：

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在《重赋》里，揭露了地方当权者为了榨取“羨余”，强迫农民负担过大税额的实情。在闾乡牢狱，尽管“中有冻死囚”，但“秋官”和“延尉”等掌管刑政的高官却孰视无睹，通宵达旦地耽于宴乐。白居易在《歌舞》里对此作了严厉的批判。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白居易的母亲猝然逝世，白居易悲痛异常，当天就辞去所有官职，退居下邳，为母亲服丧。在服丧期间，正当茶饭无心之际，刚刚三岁的女儿金銮又得了病，不久夭折。白居易越发心痛欲绝，在《病中哭金銮子》中表达了这样悲痛的哀

思：

慈泪随声迸，悲肠遇物牵。

为幼女之死而恸哭。至亲骨肉相继死去，在这样多次举行的葬礼中，白居易不能不连续思考人的死亡问题。环顾四周，活生的人们一个个相继去世，人没有避开死亡的道路。白居易诉说人生的短促，面临自己的衰老和死亡问题，感叹“念些忽内热，坐看成白头。”因此他开始从以老庄为中心的道教和主张解脱的佛教那里去揖求在儒教那里得不到的重大问题。他在《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写道：

身著居士衣，手把南华篇。

终来此山住，永谢区中缘。

但在生活上，他还是喜欢农村环境和素朴的民风，与佃农一起耕种土地，过宁静的日子，在这期间，他爱好陶潜的作品，自己也写那样的作品。有时也和住在京城的友人互通音信，通过友人的来信，白居易不能不关注政治。当他听到对肩负未来大有希望的葆存诚逝世的消息，犹如世间失去光明一般痛惜。他也深深同情目前苦于重税的农民。

江州左迁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冬天，白居易好不容易被召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震撼整个长安的大事件：宰相武元衡被暗杀。白居易对这个导致伦理和秩序发生崩溃的从未有过的事件感到无法抑制的愤怒。正值人们狼狽不堪，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直接向皇帝上奏，请求全力以赴，尽快捕获贼人。

对白居易上奏的责难，是他上谏后立即发生的，朝臣中间责难声骤然而起，《与杨虞卿书》中说：

不酌时事大小，与仆言当否，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清，而赞善夫大何反忧国之甚也？

这是被作为越权行为而遭到的责难。这样的责难白居易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他有明确的信念，但是事情不止于此。在曾受到白居易抨击的人们中，还勾起了对他的憎恶和畏惧。

“不我同者得以为计，媒孽之辞一发，又安可君臣之间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离之者，恶仆独异，又信谗谀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

这些人认为用所谓“缓期执行”的形式把白居易调回来为时过早。于是巧立种种名目，开始了再次把他贬出中央的活动。

首先提出的是：“居易言华无行。”“言浮华”是曾经加给汉代司马相如的责难，故司马相如被定论为“不周于用”，这也是白居易可以不屑一顾的。而不能不重视的是“无行”，《礼记·杂记下》明确记载：“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因为它关系到“君子”的资质，甚至关系到士大夫的存在与否。于是，正如七月所作《寄张十八》里说的那样：

径旬不出门，竟日不下堂。

白居易不得不假托有“病”，闭门絮居，打发苦闷的时光。

但是事情变得越发严重了，以唐朝《实录》为基础的《册府元龟·罪谴篇》里的记载与《旧唐书·白居易传》的中心部分几乎相同：

白居易，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先是白居易之母因看花坠时，白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名教之士讥焉。“言浮华无行”被上纲到“名教”的高度了。“名教”是指儒教以人伦为核心的礼教。议论就是从这个人伦的角度进行的。

白居易一旦被认为“伤名教”，就必然会出现“不宜置彼周行”的意见。因此，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汾郡，追授江州司马。

白居易怀着心如刀绞的痛苦，接受江州司马的任命，即时从官中退出。

白居易花费了两个月时间，途经武昌黄鹤楼，十月到达任职之地。江州好似大地的尽头，风土却和北方完全不同，气候也和长安有别。人们的习俗也看不懂，说话好像鸟叫一样听不懂。白居易就像被抛进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另外，司马这种官职在当时是有名无实的职位，只不过是给被贬之人的临时待遇。因此白居易在《江州司马厅记》里说：“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急于兼济者居之，居一日不乐”；“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确是为“吏隐”而安排的地位。

白居易在这不习惯的环境和无所作为的闲职中，不能不逐渐变得内向。他把自己的这半生写成了自传，也就是《与之九书》。其中，他首先提到了外于文化顶点的《六经》。这是儒教中最为基本的典籍，他认为，根据《六经》人的行为是应加以约束的，作为士大夫，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同时，文学也是人的行为之一，应以《六经》为准则，为实现《诗经》中的“六义”而专心致志地创作诗歌。

当时，白居易的诗歌是广为传唱的，其中之一就是《琵琶行》。这是被精炼的“京都声”所激发，从写自己的幻想开始，试图把音乐翻译成语言。

的确，《琵琶行》与以《诗经》的“六义”为原则的诗歌具有不同的性质。白居易的文学面貌开始改变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想象他的人生处世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是老庄思想和佛教。

他再也不注意长生不老之事了。当时白居易写了《蟠术谣》一诗，把自己比作《庄子·逍遥游》中的不材大木。这与其说是自我安慰，勿宁说是劝告自己立志于伸展自我理想的生活方式。原来江州以庐山为中心盛产药材“云母”。故有不少道术之士住在这里，白居易就是同这些人谈论老庄思想的。

庐山胜景有东林、西林二寺，继承了晋代高僧慧远的法灯。白居易喜爱那里的胜景和佛寺，经常来访，最后还在那里建立了草堂。在《与微之书》里描写的那里的风景：

仆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看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年竿，青苔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星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沔。

草堂建于遗爱寺和介峰寺之间，其建造在《草堂记》中有详细记载。在《香炉峰下新卜山居堂屋初成》的第一首也说：

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松柱竹编墙。

完全是超尘脱俗的雅舍。当时他还写了含有如下一联的第四首诗：

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拔帘看。

白居易只要闲暇，就到这里生活，并访问西林寺，同僧人交谈，寻求佛教的拯救。

不久，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二月，白居易被授予忠州刺史之职。他在江州度过了四年，此时已是四十七岁。白居易在给宪宗的《忠州刺史谢上表》里说：“及移秩官寮，卑冗疏贱，不能周慎，自取悔尤，”表明他已能够客观对待江州左迁之事。

与元稹意外邂逅于途中，白居易心情变得兴奋起来。于是他把他们重逢之地命名为“三游洞”，他总算把眼光又转向了外部。忠州那珍奇的荔枝和木莲树令人瞠目而视。白居易让人画荔枝图和木莲花图，并写了文章和诗歌。这里是蜀地山城，刺史之职也较稳定。白居易空闲时就到州城的“东坡”上种植各种各样的花木。有时也眺望山下的大江。

他在《春江》里写道：

闭阁只听朝暮鼓，上楼空望往来船。

他当时还写了《贺平淄青表》，“淄青”是指统治当地的李师道。

他正是引起白居易至今仍在贬谪的原因。李师道灭后，那一带都归顺了中央。白居易感到身心爽快。时值宪宗驾崩，听说实际上是宦官陈弘志害的。白居易后来在《奉酬李相公》里说：“涕泪满襟君莫怪，甘泉侍从最多时。”为宪宗之死深感悲痛。

宪宗之后太子恒即位，白居易曾担任过这位太子的赞善大夫。入夏以后，任期还远远没有满，白居易就被提前召回中央，白居易清算一下贬谪经历的时机终于来了。

高级官僚

司职长安

白居易一到长安，即被授予刑部司门员外郎。员外是定员之内的，这是为了把他从外任调回中央而采用的合适的名义。

这年十二月，吏部举行的“判”试缺少合适的考官，因此白居易被任为重考官。“判”试后过了几天，又转任礼部主客郎中，执知制诰之职，取代曾是制科门生的牛僧孺。依靠文学，已经取代作为礼部侍郎中的知制诰之职的元稹，给白居易写了制词，其中有这么一句：

朕尝礼其词赋甚喜，与相处并处一时。

这时，白居易的文学再次获得了承认。不过被视为一种“浮华”的拟制，他是不写了，而只是一味地充实像制诰这样的政治性文学。不久，元稹除中书舍人，白居易在为其写的《制诰》中说：“能芟繁词，划弊句，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引之而成伦，垂之而为典训。”

改元“长庆”（公元821年）后，白居易在新昌里购买了住宅。不久，又被加授朝散大夫，身着绯袍，又转上柱国。接着正式授予中书舍人。白居易时年五十岁，为正五品官。妻子杨氏也被封为弘农县

君。另外，白居易的同曾祖弟敏中也进士及第。

白居易在《喜敏中及第》中高兴地写道：

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

那期间，也有使白居易心思不痛快的事情。在他作翰林学士时曾经与他同职的礼部侍郎钱徽所主持的进士考试，引起了一片责难声，说其中有靠人情被录取的。围绕这种责难是否恰当的问题，高级官僚分裂为两派。以两川节度使段文昌为中心，还有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他们还把曾经提倡“新题乐府”的李绅以及元稹拉出去，站在责难的一方。与他们对立的是李宗闵、郑珣瑜之子郑覃、与武元衡事件有牵连的裴度、杨汝士，都有与自己有关系的应考者，而段文昌和李绅的关系者都落第了，事件因此而起，白居易在这两派中都有朋友，因此尽力公平地处理了这件事，其结果获得了广泛的承认。

二李官僚集团各自结成朋党，继续进行无休止的互相倾轧，成为后来展开激烈权力斗争的开端。已经预见到事情严重性的白居易保持中立。他是知悉丑陋内情的人，因此只好一人独自心痛。

复试这件事之后，元稹被授工部侍郎，作为同平章事而任宰相。这次惊人的晋升招来了非难，说他是因为勾结宦官，排斥先辈裴度而获得穆宗特任的。

白居易不了解真情，但不得不支持元稹。在宫廷内部权力者之间的斗争中，他渐渐受到了损伤。与此同时，他对穆宗的信赖也淡薄了。他被召回中央的当时，就献上了《续〈虞人箴〉》，劝谏牧猎之事。接着，针对穆宗行幸华清宫的提议，白居易和许多供奉官一起进行了谏奏，但也不为穆宗所采纳。继而就东北一带的叛乱，白居易请求停止调动大军，节约军费粮食，但这些也全不被重视。这样就失去了对穆宗的期望。白居易已经看清了权力内在的本质。

在此前后，知心朋友李建死去，元宗简也相继去世，还有密友崔韶也去世。为数有限的几个知心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白居易不想再留在京城了。他决定要求外任。

出任刺史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七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杭州又叫余杭郡，是江南“名郡”。白居易十四五岁时，曾到过苏州和杭州。当时他说：“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这回终于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并且得以脱离像在《马上作》里所流露出来的“高有罍缴忧，下有陷阱虞”那样的“朝士籍”。

白居易沉浸在解放的快乐中前去赴任。旅途中，他在曾经当了四年司马的江州歇脚，也走访了遗爱寺旁的草堂，伴随着对过去时光的回忆，在那里宿了一夜。到达杭州已是十月了。白居易即刻写了《谢上表》。誓要“下苏凋瘵，上副忧勤。”

白居易到任之后的第一个夏天就碰上了持续干旱，他亲眼看到了农民的辛苦。因此他对西湖及钱塘湖进行了各种调查。由于“春多雨，夏秋多旱”，所以修筑湖堤，增高数尺，对方圆三十里的西湖进行施工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但是这样一来就可以杜绝每年的旱灾之虞，而且可以使灌溉面积得到惊人的扩大。接着在湖的南北各设大水门，另外还规定了有关供水手续，采用了当天申请当天有效的办法。此外还修建了这样的工程，即在湖水放水的情况下，把位于东北的临平山脚下的鼎湖之水引进官河。

在治理的过程中，白居易遇到了一些很棘手的问题，不过他很快便解决了。这样一来，就证明了不但不会引起灾害，而且水质变得更加清凉。《新唐书》说这项事业“灌田千顷”，并且赞扬道：“民赖其汲”。白居易后来也写了《别州民》一诗，说：

税重多贫户，农饥是旱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其中也饱含了当初“苏凋瘵”的誓言得到实现而产生的满足感。

白居易此举不但是为了杭州人民，也照顾到了以后的官僚。他对杭州政务抱有很高的热情，并收到了成效。

白居易正因为如此努力于州政，所以在他上任才能得到享受。应着四季的时令，他策马泛舟，沉醉在美好的风光里，并写了为数不少的诗歌和文章。其中有包括如下一联的《江楼夕况》：

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

当时元稹从同州迁越州。因为越州与杭州南部接壤，所以他顺路拜访了白居易。由于二人都有离开中央的解放感，故能恢复本来就有的文学之交。不久，他们通过邮吏，相互对付“诗简”，反复酬答唱和。白居易退游于文学之中，岁月更新，原来吏部考试的同年及第者，一直交情很深的崔元亮，也来到杭州北邻的湖州出任刺史。于是元、白唱和又加上了崔氏，对于白居易来说，这是非常快乐的岁月。

任期满后，白居易离开杭州。这之前，越州的元稹把自己的诗文编成《元氏长庆集》，该文集促使白居易也把当时整理出来的诗文汇总为五十卷，托付给元稹。元稹对白居易的文集怀着尊敬的心情写序言，题名为《白氏长庆集》。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夏天，白居易被授予太子左庶子之职。庶子是太子侍从，正四品官。当时穆宗已经驾崩，敬宗即位。实际上对于白居易来说，是想找一个与政治权力没有关联的职位，因为他对权力斗争是持批判态度的。于是他再次向牛僧孺要求不作左庶子，而从杭州到东都洛阳充任分司。牛僧孺也已经对敬宗丧失了希望，故尽量满足白居易的愿望。

白居易购买了妻子的远亲杨凭的故宅，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他在《池上篇序》中这样写到：

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

他在那里安置了从杭州带回的天竺石和两只华亭鹤，开始过安定的分司生活。

但是这样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第二年即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白居易突然被任命为苏州刺史,这是宰相李程的推荐。李程曾是白居易任翰林学士时的同僚,当初为把白居易从江州调往忠州,李程曾协助过崔群。既是李程的推荐,则情不可却。且白居易少年时也有过做苏、杭刺史的理想。他怀着困惑及对洛阳之眷恋不舍的心情前去赴任。一到苏州,白居易就写了《苏州刺史谢上表》,他写道:

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

他一面这样写,一面有事已及此,必将忙煞于公务的感觉。入秋后,由于传统的“洞庭贡橘”一事,他漫游于太湖明媚的风光和清澈的湖水,感兴油然而生,创作了许多诗歌。这种感兴不久促使他制造画舫,游览城内水路。《正月三日闲行》里说: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白居易沉醉在苏州那独特的风景之中。但是岁月更新。第二年三月,他从马上摔下来伤了脚,连续卧床三旬。而且眼病又一次复发,回头看时,自己已是五十五岁,任期虽远没有满,但以生理上的障碍为理由提出辞任,他在《自咏》中流露出如下心情:

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

白居易立下了辞职的意志后,从苏州到扬州,与刘禹锡一道,共同踏上了北去的旅途。第二年回到了洛阳履道家里。

回归京都

正当白居易在去洛阳的旅途上时,敬宗被身边宦官所杀害,文宗即位。不久,韦处厚与裴度一起任宰相,秉承文宗旨意,把有声望的人们召回中央。

时代渐渐朝着有希望的方向发展。当时白居易也被任命为秘书监,时为大和元年(公元827年)三月。白居易被旧友重逢之喜所

吸引而去赴任。他在《初授秘监》里说：

紫袍新秘监，白首旧书生。

这两句充满了对漫长人生的感慨。公元827年十月，适值文宗降诞日，在麟德殿举行了“三教讲论”。作为儒士的代表来参加讲论，是相当的荣誉。白居易现在就被选为这样的人，而且被任命为主持人，这恐怕是因为他被认为不但在儒教方面，而且对道教和佛教都有很深理解的缘故吧。本来白居易从很早就被以“老庄”为核心的道教和以禅宗为中心的佛教所吸引。

佛教代表是安国寺长老义林，道教选出的代表是太清宫道士杨弘元。安国寺和太清宫都是受到王室尊誉的第一极寺观。白居易虽然声称自己“学浅才微”，但他“稽先王典籍”，对答了义林和弘元的“问”、“难”，接着对僧、道发起了“问”、“难”。于是作为主持人，他导引出三教“殊途同归”的结论。白居易把自己这次讲论的大概作了记录，这就是《三教论衡》，关于此事，《旧唐书》是这样记载的：

居易论难锋起，辞辩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

白居易被认为是当时学识丰富的人。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二月，白居易转任刑部侍郎，被封为食邑三百户的晋阳县男。

刑部执掌刑法和徒隶。白居易曾登书判拔萃科，元和末年任司狱员外郎时，就属此地。侍郎是统辖司门等部门职务的刑部的副职官员，正如《和〈降夜作〉》中所说，它具有“乘大夫车”、“统十郎官”、“掌四曹局”、“按三尺书”的地位。于是他不能不与皇帝的政治以及尚书省的人事安排发生关系，因此也有心情不快之事。不过他又认为这是实现青年时代所怀理想的一次尝试机会。他在《策林·论刑法之弊》里阐明了“法吏”的应有态度。另外他还论述了“止狱措刑”的问题。他的理念是“圜圉空虚”；他的理想是唐初贞观年代的“一岁断刑，未滿三十。”白居易在任拾遗时曾就“闕乡县禁囚”之事上奏过，进言请求“无冤滞”。到底能办多大的事情，是另外的问题，